

# 三国之战死了多少人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王朝标明为“末”的时期，都是老百姓饱受痛苦的灾难岁月。汉末三国时期，如此，唐末，宋末，元末，明末，清末，无不如此。一棵大树的倒下，不外乎外力的突然摧折，或内部的逐渐腐朽。而一个偌大王朝的覆灭，通常倒都是内因在起催死的作用，东汉末年，就是这样走向终结的。第一，天灾频仍，民不聊生；第二，官员贪黷，朝政腐败；第三，奸佞握权，虎狼当道；第四，恶行猖獗，昏天黑地。然后，黄巾遍野，赤地千里，诸侯蜂起，乱世攘争；然后，三国鼎立，征战不止，山河分裂，将近百年。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这是曹操《薤露》诗的后八句，写的是董卓胁帝西迁长安，焚毁洛阳的情景。人们习惯把汉代分为西汉、东汉，就因其首都地理位置所定。从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时起，到三国时，已有 200 多年的经营历史。华宫宏殿，芳园秀苑，繁街闹市，良驹华轩，其规模并不亚于长安。在汉人张衡的《二京赋》中，对洛阳当年富丽堂皇的盛况，很是赞美不绝。可东汉末年董卓的这把火，蔚然

王气的洛阳，一国首善之区，曾经有过数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只残留数百户人家，岂不哀哉？凡分裂，必定有战争，凡战争，必定要死人。据钱穆《国史大纲》：“蜀亡时，户，280000；口，940000。内带甲将士102000，占全数九之一。吴亡时，户，530000；口，2300000。内兵230000，占全数十之一，吏32000，后宫5000。魏，平蜀时，户，663423；口，4432881。三国合计约得，户，1473423；口，7672881。”钱穆说，“就全史（指中国全部历史）而言，户口莫少于于是时。大体当盛汉南阳、汝南两郡之数。三国晚季如此，其大乱方炽时可想。”这就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人口概况。曹操在一首题名《蒿里》的诗中，描写了当时中原一带的悲惨景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野蛮灭绝文明的大倒退，董卓迁都长安而焚洛阳，就是非常典型的一次。“火焰冲天，黑烟铺地，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这把火比起秦末那位输急了的项羽，在阿房宫放的一把火，烧了三个月也不灭的气势，可能差一点点。但其残暴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董卓杀富户，徙贫民，富者获死于非罪，贫者疲毙于徙途，即或幸免者，也难逃蹂躏践踏的虎狼之军。于是，河洛一片

焦土，赤县千里，夷为平地，数劫不复。黄巾也好，董卓也好，所有来自文明程度较低，物质状况较差的草根阶层，一旦牧民手里赶羊的皮鞭子换成枪杆子，一旦农民手里耕种的锄把子换成印把子，对于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城市，是绝不留情的。践踏，破坏，毁灭，焚烧，便是他们发泄仇恨的唯一方式。公元263年，蜀亡。公元264年，魏亡。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为晋，中原统一，老百姓总算摆脱战争阴影。公元280年，也就是西晋太康元年，吴亡，全国统一。此时全国的总人口数为1600万，与现在的上海市、北京市人口相差无几。而在公元156年，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全国总人口已经达到5000万。中国人之命若蝼蚁，动辄以万计，以十万计地被杀、被坑、被流放、被成为政治牺牲品，而大笔一挥置人生死者，连眼睛也不眨一下的。不要说公正的审判，甚至良知的谴责也没有的。等成为历史以后，一行两行字，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于是，相沿成习，习以为常，在中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里，人的价值，在握有权柄者眼里，是无足轻重的。这一百年的仗打下来，只剩下三分之一人口，中国人为分裂付出的代价，也太沉重了。（国文）

## 林则徐的“无知”



1839年6月3日，奉命赴广州禁烟的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将收缴的大量英商鸦片在距广州一百多里的虎门当众销毁。一时间，全世界都将好奇的目光对准了东方、对准了大清国。事情发生后，英国要求赔偿收缴鸦片造成的损失，遭到清王朝的严正拒绝，接着清王朝向所有“海外夷人”发布通告，停止商贸往来。看到事件朝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英国人誓言一定要报复。此时的林则徐虽然做了一些应战的前期准备工作，但其内心却对英国人不屑一顾，他向道光皇帝报告说：“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彭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他认为英国士兵不能上岸作战，“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以制也”，因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如果奔逃上岸，夷兵浑身裹紧，腰退直扑，跌倒便爬不起来，凡是内地不论怎样人民，都可杀掉这些异类，跟宰大羊一样。”

从林则徐给皇帝的这份奏折里，我们可以看出林则徐对英国军队的情况缺乏起码的了解，第一，他不清楚当时的英国海军已具备较强的陆地作战能力；第二，他不明白英国军队有发达的后勤保障系统；第三，他对现代军队习见的绑腿缺乏常识，不知其更有利于行军，而以为人一摔下去就爬不起来。林则徐对英国军队的无知，与清代闭关锁国的现实有关。因为长期闭关锁国，世界先进的知识和科学技术进不来，国人自然对外界缺乏了解，即使是像林则徐这种在国内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见多识广的官员也不例外。作为清朝官员的自大心态，更加剧了林则徐的无知。所谓自大心态，就是明明自己落后于他人，却偏偏认为事事比他人强，对他人不屑一顾。其实，林则徐的自大心态决不是虎门销烟之后才有，在刚刚迫缴鸦片时就充分暴露了出来。林则徐勒令外商交出鸦片后，曾要求他们签订一个单方拟定的协定，这就是清人所谓的“甘结”。林则徐代表清政府单方拟定的“甘结”样本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林则徐的自大。第一，他称自己的国家为“天朝”，贬外国商人为“夷人”；第二，在涉及人的生命财产等重大问题上，居然不与对方进行谈判就单方拟定条文，傲慢至极。自大到这种程度，他怎么还会有兴趣了解西方的事情呢？他又怎么可能弄清英国军队的真相呢？（宇明）

# 朱元璋为何与孟子过不去

明朝开国之初，人才奇缺，朱元璋在登位的次年，即洪武二年（1369年），诏全国府、州、县兴办学校，几年下来，颇见成效。据《明史·选举志》记载，虽然是穷乡僻壤，也都有儿童入学，弦歌之声不绝，为唐宋以来所未有。朱元璋很重视教育工作，他多次申令全国的士子非四书、五经之书不读，孔孟之书又必须以朱熹之注为准。马上可得天下，但马上不能治天下。明太祖朱元璋深谙此理，他夺取天下后，十分注重学习，在圣贤书中寻求治国之道。当他翻自《孟子》卷四《离娄章》时，龙颜大怒曰：“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因为这一章里，有这样一段话：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称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称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称视君如寇仇。”

好一个胆大包天的孟轲，竟敢鼓动人们在皇帝对待他们不好时，就把皇帝当做仇敌贼寇，那还了得。《孟子》中记载了孟子时常在各国的国君面前，直言告诫，从平民的角度告诫国君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在朱元璋看来，这有伤国君的尊严。特别是孟子的言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是让这位大明开国皇帝怒不可遏：民贵君轻，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皇帝一发怒，后果就严重了。他诏告天下，说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并发狠说，诸大臣“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可偏偏也有不怕死的读书人，一个叫钱唐的士子还是毅然上疏，反对皇帝把亚圣打入冷宫，明知劝阻皇帝有杀头之罪，仍然入朝抗旨劝谏，他说：“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明史·钱唐传》）说罢，让人抬着事先准备好的棺材，袒着胸，抱着必死的决心，向皇城奉天殿方向走去。进入奉天殿，朱元璋果然命御林军卫士杀气腾腾地引满弓，等着他的到来。见到钱唐视死如归的模样，朱元璋更加恼恨，便真的让卫士连射了好几箭。钱唐的左臂、右肩、胸部都中了箭，被射倒在朝堂上，但他仍然挣扎着向皇帝座前爬去。朱元璋不禁“为之感动”，他不仅没有因此而治钱唐的罪，还命令太医仔细地为他治疗箭伤。再加上朱元璋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的第二天，就有主管天文的官员奏报说文星黯淡无光。朱

元璋心生疑虑，认为是上天在示警。不久，朱元璋又下了一道谕旨，极不情愿地把孟子的牌位又请了回去，恢复了孟子在文庙中的一切待遇。清人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对此有记载。对多有“非臣子言”的孟子，朱元璋终究是耿耿于怀余恨难消，于是命令臣下“删孟”，并且他自己也亲自上阵，将上述那些光彩夺目的名言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85条，只剩下170多条，编就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朱元璋未曾料及的是，他的这本《孟子节文》，并没有长久流传下去，甚至到他的子孙接班当皇帝后，也不怎么强力提倡了。现在国家图书馆里，还收藏有这本书，那自然是珍本孤本，鲜有人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任何倒行逆施，都挡不住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哪怕你是权倾天下的皇帝，也只能落得“徒增后人笑耳”。

（继兴）

